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Translation*

翻译中人际意义的 跨文化建构

郑元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Translation*

翻译中人际意义的 跨文化建构

郑元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 郑元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438 - 7

I. 翻… II. 郑… III. 翻译理论 - 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579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付 钢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际意义的翻译

——语言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序言

欣闻郑元会的专著《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已经付梓，十分高兴。此书是在该同志 2005 年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翻译、优化的基础上成形的。郑元会同志原是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重点研究翻译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郑元会同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使许多在读的博士和英语老师十分羡慕。当时，我也在考虑，为什么郑元会在攻读博士期间能获得国家项目呢？他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他这个题目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当我了解了这个选题之后，我就感到这个项目的获得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必然，这是因为这个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所谓“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首先，人际意义在翻译研究中通常不被重视，所谓“信”显然是对原文内容的“信”，而人际意义没有考虑在内；第二，人际意义一直没有在翻译中被建构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范畴而作为研究的重要的对象；第三，对人际意义在翻译中如何处理一直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现在，在翻译理论建设如火如荼地发展的今天，对人际意义的翻译理论建设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人际意义是三种元意义之一，是与概念意义同等重要的。在韩礼德的理论框架中，它与概念意义平行对等，没有先后和重要不重要之分，而语篇意义则被明确定位为是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起组织作用的意义（Halliday，

1973; 1985/1989), 在其他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中通常不被认为是意义, 而是作为一种形式特征, 或者文体特征来对待。然而, 如果我们仔细对三种意义的关系进行研究, 我们会发现, 这三种意义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提出来的。

首先, 人类运用语言的目的是进行交际, 即与其他人交换信息或者情感、意图、物品, 或者表达自己的意愿等。从这个角度讲, 人类进行交际是受到交际目的促动的, 而交际目的是语境与人的个体需要或者群体需要交互的结果。语境是外在的, 是可以进行描述的, 而人的需要是内在的, 是难以由外在的手段证实的, 只能由个体自身的感受来说明。不同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 尽管有许多的理论来研究它, 它仍然是一个“黑匣子”(blackbox)。奇怪的是, 人们越是不能打开这个黑匣子, 越是对它感兴趣; 对它好奇, 大量的研究和理论框架用来讨论这个黑匣子, 但收效甚微。而对于容易研究、容易证实、容易描述的情景语境因素研究的人却并不算太多, 特别是没有形成很有效的理论。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方面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 探讨这些外部因素对内容因素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它把语言看作一个社会符号系统。所以, 首先, 它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语言, 即从群体的角度, 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from an interorganism perspective) 来看待语言(Halliday, 1978), 看语言是如何在人类的社会交际中起作用的, 关注的是群体的共性行为特征, 包括语言在社会系统、社会制度的建构中的作用, 包括在社会机构的建构中的作用, 和社会过程或称社会结构的建构中的作用。第二, 它把语言看做一个系统, 即语言符号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组合为系统, 以系统或者系统网络的形式存在的。第三, 它把语言看做一个符号系统, 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级阶和不同类型的符号组合而成的。语言运用的过程是从这个系统中选择的过程。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 从微观

上讲是由是否激活“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来决定的,而从宏观上讲,是由交际者的交际目的决定的。

人际意义的核心是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还包括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相互的情感和态度,各自的相互评价等。交际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就要交流一定的概念意义,通过概念意义来表达人际意义,所以概念意义是手段、是工具,是用以实现交际目的的,而人际意义才是控制和制约其他意义的。

由于人际意义是通过概念意义的表达来实现的,所以,它通常是隐性的,是隐含在概念意义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概念意义是最显性的意义特征,对它的选择和取舍实际上是由人际意义“操纵”的,人际意义则很大程度上寄生在概念意义之上,或者寄生在概念意义的表达结构之上,如在名词词组结构中加上表达人际意义的修饰语(epithet),或者干脆以概念意义的取舍来实现。而语篇意义是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所以,它同时又寄生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上。

由此可见,人际意义是控制和制约概念意义的,是决定概念意义的取舍的主控因素,同时它又是寄生在概念意义上的,所以,它具有隐性特征。这是以前的研究忽视它的主要原因。

由于概念意义的显性特点,在讲究翻译对等的时候,无论是词汇层面上的对等,还是句子层面上的对等,都是讲的概念意义的对等。人际意义不被承认,或者被视为想当然的东西而不作为重点谈论的对象。因此,对等理论很快失去其吸引力。

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追求翻译的完全对等只是一种理想,而且也不可取。这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如何进行翻译。例如,由于本族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差异,追求相同的韵味、相同的风格不能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相同的效果,从而产生归化翻译现象;由于母语和目标语的差异,原文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在译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表达方

式，产生所谓“不可译”现象，从而产生“意译”现象；由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是完全地把原文在目标语中再现，而是要取其中的部分用，或者因为原文中的一些内容在目标语中不能接受，或者有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等，而不能照搬原文，就需要译者对原文作适当的处理后才能翻译，如剔除不需要的部分，对原文进行压缩，对原文进行有目的的删减，这就出现了“编译”现象。

既然追求完全对等是不可取的，那么翻译的标准是什么？译文如何评价？或者在什么方面，什么层次上可以寻求对等？

我觉得翻译的标准应该和翻译的目的或意图联系起来，在明确翻译的意图和目的的前提下，再看他的译文的质量，更有“的”放矢。当然，在这之前，还需要考查译者翻译目的和意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通过翻译来侮辱或者贬低原文作者，侮辱和贬低原文文化，或者过多夸大或者“拔高”原文作者或者原文文化，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如果译者的目的合理合法，那么就on应该作为以何种方式进行翻译的重要依据。

文学翻译似乎是个例外，因为译文的价值在于忠实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整体意义和思路，产生积极的欣赏效果和教育效果。但实际上，也不尽然。首先，这里有选择采用异化和归化的问题。两者无法论孰是孰非，各有各的作用和欣赏价值；也可以两个版本同时进行。异化用以引进国外的文学意识、欣赏价值观，归化则用以适合目标语译文读者的口味，使他们容易读懂，容易接受，容易产生共鸣。其次，也有针对不同读者群的选择。如果翻译作品是为儿童或者为了年轻人，就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儿童和年轻人容易接受的话语成分。

翻译目的和意图确定后，就可以确定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即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何种处理。如在概念意义上完全忠实原文，从而把原文的全部内容、描述和论述的事件或者思想，

完全翻译到目标语，而其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如果产生冲突，则不必考虑；或者在交际目的上完全取得对等效果，原文作者的交际目的是译文作者翻译中要力图完全达到的标准，而不考虑概念意义，或某些方面的人际意义的对等。

翻译的意图和目的与译文中要传达的态度、情感和权力关系，以及判断和评价等形成一体，共同形成译文的人际意义，这些因素同时还决定对概念意义的处理和取舍。它或者忠实原文中描述的事件，但对其进行删减处理，或者对原文中的事件进行改写翻译，产生虚假翻译，或者部分虚假翻译。

在这些因素确定以后，下一步要考虑到问题是在语言层面的体现问题。译者在语篇层面对原文的处理，决定了译文语篇的特征，而译文的语篇特征决定了译文的词汇语法特征。人际意义在词汇语法层面由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主要为人际意义词汇）体现。在这里又涉及语法层面上的对等问题。在什么层面上实现语法层面上的翻译？在句子层还是小句层？是否可以在特定环境中转换句子的语气类型？如陈述句改为疑问句，是否可以把隐性情态变为显性情态，或者把语气的语法隐喻改为一致式？实际上，这些我们都不能预先作规定，而是要在翻译中根据具体的翻译意图和目的确定。

一般来讲，在语篇层面，译者对语篇的处理完成后，就可以确定如何在语法层面翻译。例如，如果译者采用异化方式，保留原文的韵味和文化特色，就需要译者在语法层面尽量保留原文的语法功能，即原文的陈述句在译文中仍然是陈述句，用来提供新的信息；原文中的情态值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隐性情态在译文中一般也为隐性等。但是，如果译者要对原文中的某些部分作特殊处理，如删除某些部分，修改某些部分，这样，译文中的 interpersonal meaning 可能相对于原文要有所改变，如更加缓和、更加强烈、显性变隐性、改肯定为否定加否定、该否定为肯定加否定等。这些

改变都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的态度、观点、情感等。

在本书中,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都作了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他首先讨论了传统翻译理论存在的问题,即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但没有明确翻译的对象是什么,从而使这些标准因没有对象而失去可操作性。而明确翻译的对象是实现人际意义的关键成分。

同时,他还提出:“语言交际的重要目的就在于建立并维持适宜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原文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实现了他们之间的交际事件,那么,翻译则通过译者的努力实现了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这就是说,译者要实现的是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这种关系是“跨文化的”,所以,需要对原文的意义和形式进行处理,而这些处理都是由译者来实现的。这样,译者一方面是工具,是传话筒;而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借用原文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作者,翻译就无所谓忠实了。这就是人际意义在起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翻译绝不是完全地复制过程,不是完完全全再现原文作者的整体意义的过程,而是成为一个手段,是译者借用原文作者当“挡箭牌”来“推销”和“兜售”自己的东西的手段。

作者然后探讨了在词汇语法层面,译者如何在语气、情态和评价系统中实现人际意义。从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分别探讨翻译中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条件、方式以及译者的主体性等问题,专门地、系统地从事人际意义建构的角度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首先语气系统是实现人际意义中交际意图的语言资源。尽管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语气作为体现语言人际元功能的概念是普遍的,跨语言的。情态作为实现人际意义中的盖然性和判断等的语言资源,是讲话者对自己话语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语气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评价与情态实现的人际意义是互补的、相互强化的,所以,和情态实现的意义是同类的。

通过讨论这三个人际意义系统在翻译中的构建过程，作者发现，翻译是一个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过程，译文的产出过程是一个基于三方交际主体的人际意义建构过程：作者，译入语读者和译者。在理论描述的同时，他还以小说翻译、诗歌翻译、网络商务翻译以及政治文献翻译为案例，进行了典型文本翻译的分析以资佐证。

最后，作者探讨了其研究成果如何对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性信息。在翻译批评上，通过解析原文人际意义和原语与目标语语言系统对比，从语气、情态和评价三个系统分别考察译者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下如何建构基于作者与译入语读者的人际意义，并以小说翻译为案例进行典型文本的翻译批评，展现了翻译批评的模式和步骤，为科学认识翻译现象、正确指导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根据。对翻译教学而言，人际意义模式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描述视角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学生从意义建构的角度认识翻译的本质。

本书还提供了一些个案研究，用来证实理论假设和如何将理论假设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同时，该研究的译例选择范围广，可涵盖集合所有的主要语篇类型，诸如小说、诗歌、政论文献及商务语篇的翻译。

由此可见，郑元会同志通过自己对国家项目的研究为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做出了贡献。尽管郑元会同志还是学术界，特别是翻译界的一个新兵，但他的起点是高的，研究是专注的，科研的路子是可行的。相信他一定能够一如既往的继续研究下去，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前景是光明的。

张德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海洋大学浮山园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前 言

翻译是主体间意义的跨语言理解与生成过程，是以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交际主体之间跨文化人际关系的建构为主要目的，然而对语言人际意义的研究在传统翻译研究途径中一直被忽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从国外来看，语文学研究关注的忠实实际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对语言的人际意义不作区分。语言学关注对等，但无法回答原文与译文在翻译作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语言元功能方面的对等问题。文化研究虽然大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但却没有回答语文学研究和传统语言学研究所遗留的问题，而是转向了翻译的外部研究。国内的翻译研究开始关注人际意义始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引进。根据已有成果，研究者已经发现翻译中人际意义的不对等现象，并就其根源进行了讨论，但也只限于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某一具体方面，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理论化论述，也没有提出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概念。

语言交际的重要目的就在于建立并维持适宜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原文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实现了他们之间的交际事件，那么，翻译则通过译者的努力实现了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从人际意义的角度来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建构以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为主体的人际意义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很复杂，他可以代表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交流，充当工具的角色，也可以发挥其主体的作用，借助作者实现译者和译入语读者之间的交流，实现译者自己的动机，但通常兼而有之。作为一个跨文化交际事件，翻译并不完全是传统研究所规定的那样，对原文本

进行复制和再现，翻译是以原文为出发点重建一个基于作者和译入语读者的新的人际意义。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现象日益复杂，对诸多翻译问题的观察、描述、解释和规范必然呼唤翻译批评的介入，而翻译批评必然预设了一个翻译理论。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下，翻译不再是单纯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转换，翻译活动被分解成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而这些因素包括了翻译活动的背景、文本的生成和接受以及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翻译生成的文本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为来自于不同文化的受体发挥作用的。

从语言交际方面来看，原文作为一个交际事件和译文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交际参与者，即交际主体的不同。即使可以将译者看作中介，那么两个交际事件中，发话者和受话者仍然是不同的。译入语读者作为不同于原文的新的交际主体，和作者及译者一道构成了新的交际行为。所以，我们可以说，翻译不是复制，严格来讲，也不是再现，而是建构，从话语人际意义的角度来讲，乃是人际的建构，而且是跨文化的。

为了摆脱传统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困境，并对传统研究所忽视的人际意义问题加以研究，本研究以韩礼德（Halliday 1994）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典型的、多方面的翻译语料为根据，从原文和译文的人际意义分析与对比探讨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分析不同意义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描述并解释翻译现象的人际意义分析模式。我们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基本理论探求和典型翻译语料分析来考察翻译过程，确立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概念，提出系统考察和研究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三个变量，建立一个描述和解释翻译的人际意义模式并进行典型译例分析，从而在确立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参数方面有所贡献。

本研究首先从翻译的角度阐述话语的人际意义，并在人际元功能理论下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以期摆脱传统研究中的理论困境，更接近于翻译现实。

其次，从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分别探讨翻译中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条件、方式以及译者的主体性等问题，专门地、系统地从人际意义建构的角度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语气系统是实现人际意义中对话潜势的语言资源。尽管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语气作为体现语言人际元功能的概念是普遍的，超语言的。语气是本研究考察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第一个途径和范畴。情态作为实现人际意义的语言资源，是讲话者对自己话语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语气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由于情态是主观判断，因而与讲话人的认知状况和意识形态相关，同时受所处文化语境的制约。评价是人际意义的第三组成部分。评价作为意义主体对人、事、物的态度可以是作者自己的，语篇所建构的，也可以是语篇以外第三种声音的。

通过这三个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确立，本研究试图提出，翻译是一个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是一个基于三方交际主体的人际意义建构过程：作者、译入语读者和译者。正如作者和译入语读者，译者主体的介入也是通过三个语义系统来完成的，即语气、情态、和评价。这三个意义主体和三个语义系统作为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观测点和描述参数构成翻译研究的人际意义模式。在理论描述的同时，我们以小说翻译、诗歌翻译、网络商务翻译以及政治文献翻译为案例，进行了典型文本翻译的分析以资佐证。

最后，翻译的人际意义模式不但可以系统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也可对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性信息。人际意义模式应用于翻译批评，通过解析原文人际意义和

原语与译语语言系统对比,从语气、情态和评价三个语义系统分别考察译者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下如何建构基于作者与译入语读者的人际意义,并以小说翻译为案例进行典型文本的翻译批评,展现了翻译批评的模式和步骤,为科学认识翻译现象正确指导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根据。由于翻译研究中对人际意义研究的疏漏以及翻译批评领域经验性,随感式点评的泛滥,本研究试图加以改变,并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化作出贡献。对翻译教学而言,人际意义模式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描述视角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学生从意义建构的角度认识翻译的本质。另外,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人际意义模式也要求翻译教学有所侧重,从而对传统翻译教学模式起到改善和补充的作用。

本研究实践与理论并重,从典型翻译语料出发,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分析翻译中话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情况,描述其条件和方式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完成描述翻译的人际意义模式建构。人际元功能理论用来描述翻译,就是要揭示这种人际意义是如何建构的,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

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对已往研究的回顾”从语言人际意义的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回顾和总结,指出尽管人际意义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内容,传统翻译研究对语篇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存有疏漏。

第二章“翻译研究的人际意义视角”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人际功能的理论,然后从语言人际意义的角度对翻译的定义和关键性概念进行了检讨,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人际意义框架并指出其应用价值。

第三章“语气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从语气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本章首先阐述了语气系统

作为语言资源所实现的人际意义,通过原语和译入语语气系统的对比描述翻译中人际意义建构的条件、制约因素、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等问题并结合实际翻译语料进行了分析论证。

第四章“情态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从情态意义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首先阐述了情态系统和语言的人际意义,指出情态的人际、语言、文化等意义特征,从批评语言学 and 叙事学的视角描述了翻译中情态意义的建构情况,分析了参与情态意义建构的作者、目的与读者和译者等主体之间的互动。最后以严复和胡适为例着重说明了情态建构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

第五章“评价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从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等角度探讨了语言评价系统的意义特征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识别,从评价的介入、态度和级差等方面分别描述了翻译中评价意义的建构情况。以实际翻译语料为根据探讨了翻译中建构评价意义同时是译者主体性的介入。

第六章“人际意义与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从理论上论述了翻译的人际意义模式在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指出人际模式支撑下的翻译批评可对翻译作品进行有理有据的文本分析和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经验性、主观性点评式批评的缺欠,以实例分析描述了人际模式下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及其步骤。对于翻译教学而言,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对翻译的理论描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框架,有利于学生认识翻译的本质,翻译目的得到清楚客观的界定,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质量的评价有了可资依赖的标准。其次,教学内容有了清晰的界定。另外,在教学方法上,将翻译技能的教授与人际意义建构意识的培养相结合,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动机和教学效果。

本书的个案研究一方面用来验证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可将理论假设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

尽管数量有限，本研究译例的选择力图涵盖尽可能多的语篇类型，诸如小说、诗歌、政论文献及商务语篇的翻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所用的语料有限，但其理论价值对所有类型的语篇翻译却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	(1)
第一节 人际意义与国外的翻译研究	(1)
一、语文学研究	(1)
二、语言学研究	(4)
三、文化研究	(8)
第二节 人际意义与国内的翻译研究	(11)
第三节 反思	(14)
第二章 翻译研究的人际意义视角	(19)
第一节 理论基础	(19)
一、概览	(19)
二、语言作为社会符号	(20)
三、语篇和语境	(22)
四、语言的人际意义	(23)
五、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27)
第二节 重释翻译	(28)
一、对传统翻译定义的解读	(29)
二、翻译作为跨语言交际	(32)
三、翻译作为跨文化人际意义的建构	(34)
四、可译性	(42)
第三节 人际意义与翻译的应用性研究	(44)